

旅游时代的文化叙事

——
闽西的客家化进程
和客家符号的建构

余达忠 著

海外借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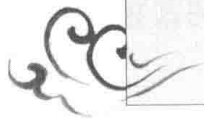
泉州师范大学出版社

旅游时代的文化叙事

闽西的客家化进程和客家
符号的建构

LVYOU SHIDAI DE
WENHUA XUSHI

余达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时代的文化叙事：闽西的客家化进程和客家符号的建构 / 余达忠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98-0971-1

I. ①旅… II. ①余… III. ①客家人—民族文化—研究—福建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54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421008)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00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走在路上的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旅游时代	1
第一节	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旅游时代	1
第二节	旅游与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旅游发展的演进路径	9
第三节	故事讲述：旅游时代的历史重构	15
第二章	客家观念的建构与现代客家的文化认同	25
第一节	客家的污名化与客家观念的建构	25
第二节	全球化与现代客家运动	41
第三节	现代客家的文化认同	56

第三章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闽西的客家化进程	69
第一节	作为地理与文化空间的闽西	69
第二节	闽西客家：以汀州为中心的考察	80
第三节	族谱中的客家：石壁文化符号的建构	92
第四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闽西的客家化进程	103
第一节	闽西客家的重新发现与自觉认同	103
第二节	闽西客家化进程：宗族重建与客家认同	114
第三节	闽西客家化进程：从社会精英到地方政府的 共识	123
第五章	旅游时代的文化叙事：闽西客家符号的建构 与客家品牌的打造	135
第一节	客家符号建构：客家祖地与客家母亲河	135
第二节	世界文化遗产：客家土楼文化品牌的打造	144
第三节	客家符号的建构与客家文化品牌的打造	154
第六章	客家祖地石壁文化符号研究	169
第一节	建构：一个文化符号的形成与演变 ——宁化石壁祭祖的人类学研究之一	169

第二节	旅游时代：文化品牌的打造与传统重建 ——宁化石壁祭祖的人类学研究之二	184
第三节	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客家的文化认同 ——宁化石壁祭祖的人类学研究之三	196
第七章	客家闽西与全球客家：旅游时代客家区域社会 重构	213
第一节	客家闽西与全球客家：对现代性的响应与闽 西区域社会的重构	213
第二节	旅游发展与闽西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建设	228
参考文献		243
附录一	从边缘到中心：近代以来客家观念的建构与客家发展 空间的扩展	250
附录二	文化叙事与历史现场：区域社会中的客家研究与 客家学——以《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为中心	266
附录三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非领土扩张化和本土重建	279
附录四	余达忠论著目录	294
后记		298

第一章

走在路上的现代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旅游时代

第一节 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旅游时代

我们无可选择地置身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从公元 1500 年前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到
20 世纪中期,终于成为一场遍及全球的伟大运

动。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被动,都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中期后,伴随着科技革命的一次又一次浪潮,借助科技的力量不断扩张,资本的国际化达到了更深、更广的程度。至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1月19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演讲时,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给予高度评价:“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经济的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生活现象,辐射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由此将人类带入全面的全球化进程中。

我们强调的全球化是远远比经济全球化宽广的一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进程。人类的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内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带动了人类文化生活、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宗教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互动和互渗,由此,使全球化获得了相当广泛的世界意义。著名学者吉登斯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

^① 庄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起点与分期》,《国际论坛》,2000年第1期。

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①全球化是一种世界状态,以现代通信技术、运输技术发展,世界性资本市场形成,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发挥作用,环境危机、人口危机、核威胁、毒品泛滥等现象为表征。全球化是一个泥沙俱下的进程,但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带来整个世界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生活产品的极大丰富与改善。全球化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将人类历史引向了现代。现代化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目标,是人类社会经历中世纪后的一个必然的进程。我们不能拒绝现代化,同样,也不能徘徊在全球化之外。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早的探索者、开拓者,比哥伦布的航海更早,中国航海家郑和就率领其庞大的船队,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谱写了人类最早的全球化史诗。此后几百年间,虽然中国的发展有所滞缓,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化进程的伟大参与者。走在全球化的路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目标和方向。2012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的经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5页。

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条重点线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沿岸),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据“一带一路”的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的深刻揭示,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布局和有效途径。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也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这些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得到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和肩负的巨大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建立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环境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化,建设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今发展的主流和趋势。这应该是我们对于全球化认识的一个思想起点。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说:“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

(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①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说:“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②正是全球化带来的对空间距离的超越,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整体意识和复杂的联结以及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危机,使旅游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除了感知到经济的一体化、信息的网络化、文化的非地方化等表征,最深刻的印象还包括旅游的时尚化和生活化。旅游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的标志。全球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旅游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旅游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走在路上,是现代社会永远的时尚;另一方面,旅游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巨大的。在传统社会,旅游是一种贵族化的生活方式,是极少数有钱又有闲的人的一种奢侈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旅游开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活动,成为人们享受和追求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当旅游提升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是全面的、深刻

①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页。

② 转引自杨学功《拒斥还是辩护: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我们应当重视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旅游。简单地看,旅游就是人们离开家,离开日常生活地域的一种非功利性的出行方式。这是我们对旅游的一般理解和认识。但是,随着“现代”的不断推进和展开,我们发现,不但旅游由贵族化的活动演变为平民化、大众化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旅游——走在路上,已然成了现代性的一种方式、一种标志,而且也动摇了我们对旅游的本质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一般而言,我们将旅游看作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出离,是相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早期的国际组织也大多在这个层面上来定义旅游。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介入旅游研究后,现代性与旅游联系在一起。学者们强调现代社会的旅游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现代性提供了旅游得以发生的社会条件,包括结构性条件(收入的增加、带薪休假制度、便利的交通、标准化的住宿等)和文化条件(公民权利、出行的自由、休闲权等),也只有在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旅游才会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旅游的平民化)、客观性(旅游的消费性和商品性)、强制性(旅游需求的不可逆转)的社会事实。作为第一个明确地从现代性社会学来解释旅游现象的学者,麦肯莱尔(MacCannell)把旅游看作类似于宗教的、赋予人生以意义的神圣活动,现代化导致了宗教的衰落和世俗化,而旅游则取代宗教成为人们寻求“本真”(authenticity)和“意义”的新渠道,是人们远离现代社会而去追求真实的“世俗的朝圣”(Secular pilgrim)。^①另一学者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则进一步认为,旅游是一种突出的现代性现象,旅游的目的就是体验新奇和生活变化所带来的愉悦。现

^① 参见王宁、刘丹萍、马凌等编著《旅游社会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4页。

代人的疏离促使他们去别处寻求真实的生活,“只有当人们对超出其自身习惯的事物形成了广泛的兴趣的时候,只有当人们认为接触、理解和沉醉于陌生和新奇有其自身价值的时候,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才可能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彻头彻尾是一种现代现象”^①。我国学者王宁也强调,旅游是现代生存条件下、身处全球化中的人们对现代性的既“好”又“恶”的表现。^② 现代是与传统相对的。传统的背景是悠久、广大、深厚的农耕社会,传统生活建立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上。农耕是一种以体力劳动为主,以自然生态作为对象的手工劳动方式,人们立足于苍天之下、厚土之上,按照自然时序生活和劳作,对自然表现出依赖和顺从的心态,整个生活的节律是舒缓的、从容的、简约的、朴拙的,世界和生活都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人们有一种充实感和安全感。而现代的背景则是不断扩张的工业化,现代生活建立在机械生产、化工生产、电子生产等主要生产方式上。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不再依赖于自然,而是朝着征服自然、超越自然的方向迈进。这种关系的改变,不但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更带来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他不能把握飞速变化的生活,甚至怀疑所置身的生活的真实性——在现代社会,一切都可以制造出来,都能够进行复制,甚至包括生态环境。这必然导致人们产生焦虑,产生一种迷失“本真”的焦虑,导致人们对生活的意义产生置疑,对存在产生诘问,生出荒谬感,一种关于自身和世界的荒谬感。我们说旅游是一种

^① [以]埃里克·科恩:《旅游社会学纵论》,巫宁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第48页。

^② 参见王宁《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见尹德涛等《旅游社会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129—136页。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就在于旅游能够让人们短暂超越和脱离当下飞速发展的不真实的、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生活状态,满足人们寻求“真实”的愿望,为人们提供寻求生活意义的一条可行的途径和方式。确实,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不是单纯为走在路上而走在路上,而是通过走在路上来表达对“现代”的反抗,通过走在路上去探寻、体验、建构一个想象中真实的、有意义的世界与生活。

第二节 旅游与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旅游发展的演进路径

1839 年,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发行了第一批新型旅游指南,即克莱因的《莱茵河之行》,从此,旅游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商业化的道路,更多的人踏上旅途。但旅游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时尚,则是在 20 世纪中后期后,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资本全球扩张的一个方面。美国学者索尔斯坦·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分析,在 1936 年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休闲消遣、丰富阅历或疗养为目的而去旅游的可能性,总是由特权阶层所享有。“只是在 1950 年之后,才真正进入大众化的国际旅游繁荣期。……首先,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工业化国家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二是通过承认劳动者享有休假权的社会法的推动。……其次,是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旅游费用的降低。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旅游费用的降低,使许多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德国人走出国门,驱车前往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或濒临亚得里亚海的意大利海滨去旅游、观光和度假。……此外,旅

游接待和信息服务有了改善;各国鼓励旅游的政策不断出台,如简化海关手续、增设旅游娱乐设施,除传统旅馆外,还兴建旅游度假村;各旅行社和旅行批发商的服务的及时供给,也使游客越来越多。上述诸方面,都是促进国际旅游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①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大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的大众化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至20世纪后期,旅游业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在我国,旅游作为一种产业,作为一种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自觉发展的。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实行,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随着国门的开启,许多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好奇的外国人通过各种途径纷纷进入中国,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终于可以回国回乡省亲观光了,而海外的资金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到国内投资兴业。正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带来了国内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在我国,1978年以前,虽然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就一直存在,但其规模远远不能成为一种产业,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入境旅游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作为一种经济产业的地位逐渐确立,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渐显著。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旅游发展的大幕,终于徐徐拉开。

属于中国的旅游时代,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终于到来了。

^① [法]罗贝尔·朗加尔:《国际旅游》,陈淑仁、马小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8—9页。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是从入境旅游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各个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经济建设活动的时期,正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物质投入的时期,正是需要大量外汇的时期,正是需要想方设法改善各方面条件,尤其是基础设施条件和基本生活设施条件的时期,正是经济激起人们心中蛰伏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激情时期,外国游客、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通过各种途径、方式,怀着各种目的、需求进入内地,无论是观光猎奇,还是省亲走访,或是投资兴业,他们的到来都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这些人的内地行中,人们不但看到了与“文革”时期宣传提倡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方式,还看到了发展经济的机会,看到了振兴地方的一条可能的途径。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历史上与海外一直存在多种联系的东部沿海省份,更是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入境高峰。这些入境人员以观光、走访、探亲等旅游形式为主,他们带来的外汇资金、经济行为、生活方式、观念形态、市场意识等,一方面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让封闭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与海外的巨大差异,看到经济在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生活品质上的巨大作用,意识到建立产业、形成市场流通机制对推动和发展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人们发展经济、建立产业、开拓和经营市场的信心,让人们看到了经济、市场、产业所潜隐的巨大能量。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省份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相对开放的经济市场能够迅速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些入境人员的推动和影响。而且,这些入境游客,尤其是回乡观光、省亲、走访的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出于浓烈的乡情,多慷慨出资捐献,为地方修桥筑路、建校办学、资助贫困人员和家庭,使热衷地方公益事